



珞珈语言文学丛书

《三国演义》的现代误读

鲁小俊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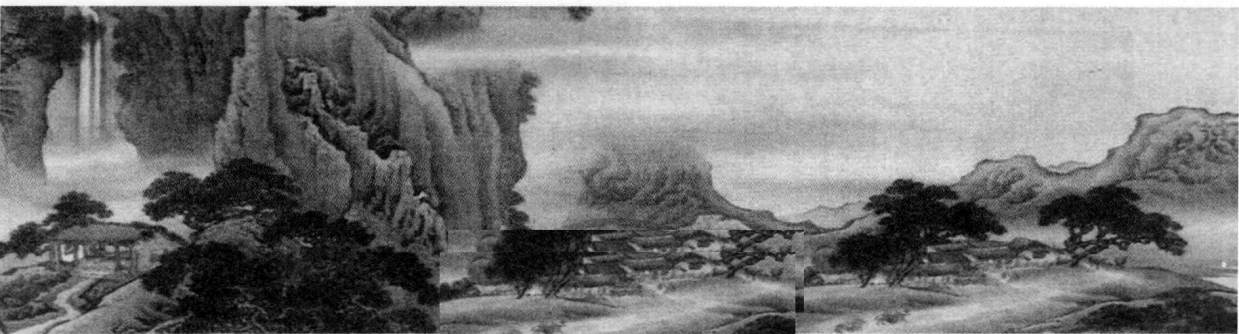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珞珈语言文学丛书

《三国演义》的现代误读

鲁小俊◎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三国演义》的现代误读 / 鲁小俊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5. 3

ISBN 978 - 7 - 5161 - 5630 - 8

I. ①三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《三国演义》研究 IV. ①I207.4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1815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李炳青

责任校对 周 晨

责任印制 李慕寒



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(邮编 100720)
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中文域名: 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
发行部 010 - 84083685

门市部 010 - 84029450

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张 15

插页 2

字数 253 千字

定价 52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 - 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引言	(1)
----------	-----

《三国演义》“研究之研究”——“误读”是一个突破口——
“汉寿亭侯”的笑话——知识类问题的正误对立——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意义——读者诠释的多种可能——“误读”的多重含义——历史·文本·社会——作者·文本(小说)·读者

第一章 历史·小说:“史蕴诗心”与“话语体系”	(1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一节 “史笔”与“诗心”	(15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三国演义》具有“教科书”的功能——“教科书”招致的非议——《长恨歌》的公案——“诗具史笔”和“史蕴诗心”——“历史小说”的“诗心”——很多误读缘于忽略“诗心”

第二节 史家立场与演义趣味	(27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“落凤坡吊庞士元”的掌故——史家笔下“事实”面和“意义”面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于“事实”之外有“意义”在——演义的“意义”较之于史书的“意义”更具哲学意蕴——诸如虚实问题的争论常常出于对演义趣味的隔膜

第三节 “泛谋略化”与“去诗心化”	(3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三国》谋略学著作数量很多,但地位不高——“应用研究”的学术价值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不以成败论英雄——刘备伐吴的“玄远”之处——“纷纷世事无穷尽,天数茫茫不可逃”——“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”

第四节 封建迷信、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	(4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“精华”和“糟粕”——作为“糟粕”的“封建迷信”与那些

“精华”实生于同样的土壤——诸葛亮的“迷信”不是一个突兀的存在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不能没有“封建迷信”的内容——“科学性”的解读属于“现代话语”——“封建迷信”不是“浪漫主义”也不是“现实主义”

第五节 循环与进化 (48)

历史循环论与“唯心主义历史观”——朝代循环论与历史进化论——天命观与循环论——“局限性”与“进步性”——《三国演义》的悲剧感和超越感

第六节 小说间的比赛 (52)

“排行榜”的魅力——“小说审定会”排出的等级和座次——游戏趣味与严肃之旨——比赛的项目和规则——“善读”与“不善读”的问题是“项目”和“规则”无法规定的——文学或艺术作品之间的比赛实在是个难题

第七节 名著的“高下” (59)

“喜欢”或“不喜欢”只是情感取向而非学理判断——标准的多少与高下的判断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与《红楼梦》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与《西游记》——名著之间不宜以某些方面的差异而判别整体高下

第二章 文本·社会：“前现代”说的“洞见”与“不见” (66)

第一节 刘备“吃人”与“人的文学” (68)

刘备“吃人”——《狂人日记》与“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”——“习得性食人”——“我们的心灵麻木到了什么程度”——“人的文学”——“反人性”和“反文明”——刘备能算仁慈君主吗——“仁君”是个相对概念——“仁君”的理想性质——《三国演义》里的“人”的立场

第二节 “弱势群体”与“乱世英雄” (78)

关注“弱势群体”反映出一种进步的观念——残暴的张飞能否算英雄——说张飞好不是说他一切皆好——英雄们对“弱势群体”到底有没有关爱和怜悯——“内心的本质”相对于复杂的人物形象或历史现象显然过于单一——围绕“火烧新野”和“携民渡江”的争议

第三节	“非事实中”如何“觅出事实”	(89)
	貂蝉和连环计——“我们这个民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”——合理与趣味——“人民称快”与“看客”——“英雄”与“奴隶”——现代性的陷阱——我们对传统的理解远没有“五四”启蒙者那样感同身受——“非事实”自身的本质容易被我们忽略	
第四节	赤子之心与英雄情结	(95)
	刘璋的“仁义”与刘备的“爱民”——刘湛的“血气之勇”与刘禅的“人性胜仗”——“人”与“非人”——以为小说只有一种爱憎鲜明的立场的看法不符合实际	
第五节	以《红楼》之眼看《三国》	(101)
	贾宝玉可做“大总统”——赤子之心——刘璋和刘禅若在《红楼梦》里会怎样——《三国演义》比《红楼梦》离人的灵魂远——关注“事功”能否成为“经典”——历史的洞见未必是文学的洞见——《隆中对》与北伐——诸葛亮的“愚”	
第六节	社会影响:历史主义与普遍主义	(111)
	小说“入人深”、“行世远”——影响的有限性——影响与原著——影响与读者——小说写“善人”、“善事”会不会有“消极影响”——“桃园结义”和“义释华容”——“《三国演义》—游民文化”——“《三国演义》—暴力美学”——胡适和钱玄同关于《三国演义》的不同意见——“历史主义”和“普遍主义”的矛盾	
第三章	作者·文本·读者:误读的内在理路和外围因素	(131)
第一节	解读的前提与意义的阐发	(131)
	“两个罗贯中”——我们的理解常常基于尚未确证的前提——对待曹、刘的态度与小说的成书时间——诸葛亮形象与神话人物夸父——意义的阐发是否合理不只取决于文本自身——“《三国演义》—游民文化”说的两个前提条件	
第二节	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	(141)
	关羽的性格弱点——无心使然与有意为之——胡适:“想写一个神武的关羽,然而关羽竟成了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。”——夏志清:“罗贯中不是出于无心或草率而是有意采用	

了陈寿的观点。”——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是否一致与作品成就的高下

第三节 “对外宣传”与“衷心底蕴” (147)

读者的困惑——《三国演义》的文本是否存在“表象”和“真实”的巨大分歧——政治人物言不由衷或者另有所虑是生活的常态——“拥刘反曹”与“明反曹，暗反刘”——“反讽”——罗贯中算不算思想家

第四节 关于“垮掉的一代”：读者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 (158)

称衡“炫耀自己、诋毁领导”的悲剧——“垮掉的一代”——“狂生”与“精神贵族”——称衡之狂大有深意——“家训体”——“现实关怀”与“终极关怀”

第五节 “爱情”及其他：语言、文体与误读 (166)

关羽的“爱情”——“爱情”是个新名词——“爱情”成功地让关羽走下神坛——“文各有体，得体为佳”——“说狠话，下猛药”——语言的陷阱随处存在

第六节 俯仰之间：阅读的视角问题 (170)

“今不如古”与“古不如今”——“站得高，看得远”——“英雄史观”与“群众史观”——读《三国演义》经常会有“心理暗示”——“苛责古人”或“全盘肯定”实由“俯察”或“仰观”所致——理想的视角当为“平视”

第七节 “影响的焦虑” (176)

唐诗的伟大成就是对宋人的“挑衅”——《三国演义》的后来者面临“挑衅”——学者和作家同样“焦虑”——“肖子肖孙”与“膏粱纨绔”——缘于故立“异论”的误读

结语 (182)

“论古必恕”——能“恕”方能有“公心”——关于“古”的辨正——“徇史以迁德”——“论古必恕”有别于“徇史以迁德”

附录 1 《三国演义》与民俗文化初探 (188)

附录 2 论“桃园结义” (195)

附录3 天道的循环与人道的悲剧	
——《三国演义》的讲史基调	(205)
附录4 论“柴堆三国”	
——以《三国演义大辞典·传说故事》为例	(212)
参考文献	(224)
后记	(230)

引 言

本书的主要内容，是关于 20 世纪以来“《三国演义》研究”的研究。^①

20 世纪以来的《三国演义》研究，与明清学者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以及感悟式、评点式的批评方式相比，在研究范式上完成了重大转型，从而走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。国内外学术界在罗贯中的生平籍贯、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时间、版本整理和研究、主题思想、人物形象、创作方法和艺术成就、应用研究、《三国志平话》和《花关索传》等相关文献、数字化工程、三国文化等方面，探讨甚勤，成果甚丰。有关百余年来《三国演义》研究的回顾、评价和展望，也成为近些年的重要课题。王丽娜《国外研究〈三国演义〉综述》^②，沈伯俊《建国以来〈三国演义〉研究综述》、《新的进展，新的突破——新时期〈三国演义〉研究述评》、《面向新世纪的〈三国演义〉研究》^③，梅新林和韩伟表《〈三国演义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》^④，王立和王惠丹《近年〈三国演义〉研究综述》^⑤，喻镇荣《〈三国演义〉应用性专著研究》^⑥，陆勇强《二十世纪罗贯中研究鸟瞰》，卫绍生《新世纪〈三国演义〉作者之争》^⑦，纪德君《百年来〈三国演义〉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顾与思考》^⑧，沈伯俊和金文

① 有关“三国志演义”或“三国演义”之名，本书不作辨正，除引文外，通称“三国演义”。

② 《〈三国演义〉论文集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。

③ 《〈三国演义〉新探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。

④ 《文学评论》2002 年第 1 期。

⑤ 《锦州师范学院学报》2003 年第 4 期。

⑥ 《黄鹤楼前论三国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。

⑦ 全国第十七届《三国演义》研讨会论文。

⑧ 《广州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5 年第 6 期。

京《中国和日本：〈三国演义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》^①等论文，以及黄霖等《中国小说研究史》^②、齐裕焜和王子宽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》^③、黄霖主编《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·小说卷》^④、沈伯俊和谭良嘯编著《〈三国演义〉大辞典》^⑤、郭素媛《〈三国演义〉诠释史论》^⑥等著作中的相关章节，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。

这些论著全面梳理了20世纪以来海内外《三国演义》研究的历程，总结出若干成就和不足，对于《三国演义》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同时，这些学术史性质的论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，即“综述”意识、“范围”意识较多而“理论”意识、“问题”意识较少。具体表现为多做历时态的述评（划分出不同的学术时期）^⑦，以及专题性质的分类（列举出若干版块）^⑧，而较少从学术理念、范式、方法等角度进行探讨（当然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前述论著的写作体例有关）。“综述”和“范围”的特点在于全面描述学术史脉络，具有“一览众山小”的优势，对于若干学术观点及论争的“内在理路”则不易把握。若要在《三国演义》“研究之研究”方面取得突破，需要突出“理论”意识、“问题”意识，从而“深入此山中”，与“一览众山小”相辅相成，方可全面而细致地把握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现状。

“误读”是一个突破口。有关《三国演义》现代学术历程的回顾，“误读”是一个层出不穷却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“问题”。尽管在具体的

① 《文艺研究》2006年第4期。

②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

③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。

④ 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。

⑤ 中华书局2007年版。

⑥ 山东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。

⑦ 例如梅新林、韩伟表《〈三国演义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》（《文学评论》2002年第1期）将20世纪的《三国演义》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：20世纪前50年，《三国演义》研究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，其中在20年代和40年代出现了两个高潮；50—70年代为第二个时期，其中又可分为“文化大革命”前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两个阶段；80—90年代是《三国演义》研究的多元发展阶段，也是20世纪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。

⑧ 例如黄霖主编《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·小说卷》（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）第九章“《三国演义》研究”第三节“80、90年代的《三国演义》研究”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：1. 文献研究（包括作者、成书时代、版本源流等方面）；2. 文本研究（包括主题思想、人物形象、创作方法、虚实关系、叙事结构、叙事艺术、战争描写等）；3. 文化研究（包括“三国文化”的概念、《三国演义》的文化内涵、应用价值等）。

文本解读和外围研究中有过不少争鸣，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集中从“误读”的角度梳理《三国演义》研究现状的论著。以“误读”为切入点，将视角扩展至《三国演义》诠释与接受中的若干理论问题，可以从一个较少为人所注意的角度反思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现状，进而加深对《三国演义》的理解。

需要辨析的问题是，何为“误读”？

不妨从关羽的封号说起。关羽斩了颜良，解了白马之围，曹操奏请朝廷封他为汉寿亭侯。事见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。可是，这个封号里有个“汉”字，便引出后来的许多故事。宋代洪迈《容斋四笔》卷八《寿亭侯印》记有几枚“寿亭侯印”，被人当作文物供奉：

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，有寿亭侯印一钮，其上大环，径四寸，下连四环，皆系于印上。相传云：绍兴中，洞庭渔者得之，入于潭府，以为关云长封汉寿亭侯，此其故物也，故以归之庙中。南雄守黄兑见临川兴圣院僧惠通印图形，为作记。而复州宝相院又以建炎二年，因伐木，于三门大树下土中深四尺余，得此印，其环并背俱有文云：“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。”今留于左藏库。邵州守黄沃叔启庆元二年复买一钮于郡人张氏，其文正同，只欠五系环耳。

洪迈说：这些都是假古董，因为“汉寿乃亭名，既以封云长，不应去汉字”^①。又，《明史》卷五〇《志第二六·礼四》“南京神庙”载：

关公庙，洪武二十七年建于鸡笼山之阳，称汉前将军寿亭侯。嘉靖十年订其误，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。^②

从洪武二十七年到嘉靖十年，关羽稀里糊涂地做了一百三十多年的“寿亭侯”。

再看《三国演义》嘉靖元年本^③卷六《云长延津诛文丑》：

①（宋）洪迈：《容斋随笔》，岳麓书社1994年版，第477—478页。

②（清）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第1304页。

③ 简称嘉靖本，下同。本书所引《三国演义》，如未特别说明，皆据嘉靖本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）。

却说曹操为云长斩了颜良，倍加钦敬，表奏朝廷，封云长为寿亭侯，铸印送与关公。印文曰：“寿亭侯印”，使张辽赍去。关公看了，推辞不受。辽曰：“据兄之功，封侯何多？”公曰：“功微，不堪领此名爵。”再三辞却。辽赍印回见曹公，说云长推辞不受。操曰：“曾看印否？”辽曰：“云长见印来。”操曰：“吾失计较也。”遂教销印匠销去字，别铸印文六字“汉寿亭侯之印”，再使张辽送去。公视之，笑曰：“丞相知吾意也。”遂拜受之。

这一段定是罗贯中精心营构之笔。在他看来，“寿亭侯”前有没有那个表示大汉王朝的“汉”字，关系到关羽的品格，万不可等闲待之。后来毛纶、毛宗岗父子评改《三国演义》，知道这是个误会，便将这段话全部删去。第二十六回回评说得很清楚：

今人见关公为汉寿亭侯，遂以“汉”为国号，而直称之为“寿亭侯”，即博雅家亦时有此。此起于俗本演义之误也。俗本云：“曹瞒铸寿亭侯印赐公而不受，加以汉字而后受。”是齐东野人之语，读者不察，遂为所误。夫汉寿，地名也。亭侯，爵名也。汉有亭侯、乡侯、通侯之名，如孔愉为余不亭侯，钟繇为东武亭侯，玄德为宜城亭侯之类。《蜀志》：“大将军费祎会诸将于汉寿。”则汉寿亭侯犹言汉寿之亭侯耳，岂可去“汉”字而以“寿亭侯”为名耶？鸡笼山关庙内题主曰：“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之神。”本自了然。余则谓当于外额亦加一汉，曰“汉汉寿亭侯之祠”，则人人洞晓矣。俗本之误，今依古本校正。^①

“汉·寿亭侯”之类的笑话缘于对“汉寿”、“亭侯”的误读^②。《三国演义》中这样的误读远不止一处，如嘉靖本卷八《徐庶走荐诸葛亮》，

① 本书所引毛评本，皆据中华书局1995年排印本（刘世德、郑铭点校），不另出注。

② 因“汉”而致误的又如“汉钟离”。（清）褚人获《坚瓠集》广集卷四《钟离汉寿》：“钟离云房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。世人误以汉字属下，作汉钟离，而遗其名矣。关公在曹时，操表封公为汉寿亭侯。汉寿本亭名，在犍为，即今叙州府也。世又误以汉为国号，止称寿亭侯。同一汉字，属上属下，皆成误谬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964页。

徐庶对刘备说：“某本颍川徐庶，字元直，为因逃难，更名单福。”徐庶的这个化名有正史的依据吗？有。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云：“庶先名福，本单家子。”^①可是，我们由此只知道徐庶原名福，后改名庶，却不能得出他曾姓单（音“善”）的结论。原来，是罗贯中误读了“单家子”。所谓单（音“丹”）家，意即孤寒人家，以别于豪门大姓。如《三国志·王肃传》注引《魏略》：“薛夏字宣声，天水人也。博学有才。天水旧有姜、阎、任、赵四姓，常推于郡中，而夏为单家，不为降屈。”这里的“单家”和徐庶“本单家子”的“单家”皆指孤寒之家。望文生义，很容易以为是“姓单的人家”。清代史家钱大昕《诸史拾遗》卷一曾举裴《注》其他四处称“单家”，及《后汉书·赵壹传》所称“单门”之例，证明“凡云单家者，犹言寒门，非郡之著姓耳……流俗读单为善，疑其本姓单，后改为徐，妄之甚矣”^②。《三国演义》嘉靖本的这一处误读，毛评本一仍其旧。也许，毛氏父子对“单家子”的理解和罗贯中一样。

据此可以说，“误读”就是错误的解读，与之相对应的是“正读”，即正确的解读。具体到上述数例，“汉·寿亭侯”是误读，“汉寿·亭侯”则是正读；“单（音‘善’）家子”是误读，“单（音‘丹’）家子”则是正读。对于此类知识性问题，确实有着非此即彼、正误对立的区别。作为批评术语，“误读”一词之被广泛使用，也主要立足与“正读”相反的意义^③。这种“误读”，或称为“反误”，其对立面是“正误”^④。

“误读”还有另外的含义。

清人凌廷堪曾有一段关于“实事”与“虚理”的感慨：“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。夫实事在前，吾所谓是者，人不能强辞而非之；吾所谓非者，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，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。虚理在前，吾所谓是者，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，吾所谓非者，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

① 本书所引《三国志》，皆据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，不另出注。

② （清）钱大昕：《考史拾遗·诸史拾遗》，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，第5页。

③ 例如沈伯俊《罗贯中给予读者的三个误读》（《晚报文萃》2008年第17期）列举了三个误读：历史上没有“过五关斩六将”之事；曹操和张飞的亲戚关系被抹去；历史上并无貂蝉其人。

④ 参见童庆炳主编《文学理论教程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345页。

也。如义理之学是也。”^①在他看来,“实事求是”之学(朴学)比较可靠,而“义理之学”(理学)太过玄虚,极易陷入“彼亦一是非,此亦一是非”的尴尬境地。推而言之,不只是“义理之学”,在很多情境中,“误读”和“正读”皆非简单的二元对立^②。

即以历史事实而论,传统史学认为,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从文字、实物等一大堆材料中还原和再现历史真实。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就是信史、良史,也即“正读”,否则便可以说是“误读”。但是,那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吗?怀有这个疑问的代不乏人,尤其是西方的新历史主义兴起以来,历史的客观性、稳定性、连续性不断被重新审视。在新历史主义看来,所谓客观事实是不可靠的,历史总是以“表述”的形式出现。历史学家不能宣称他的研究是客观的和超然的,他也只是按照他的理解去建构文本或话语。“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”,是对这一批评理论的生动概括。所谓“文本的历史性”,指一切文本(包括文字的文本和广义的社会大文本)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;所谓“历史的文本性”则包括两层意思:一指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文本,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真正的、完整的过去;二指这些文本在转变成“文献”、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的时候,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^③。作为一种“后现代”的历史观,新历史主义有其自身的局限^④,但其理论意义却是不容否定的。至少它凸显了一个事实:有关历史,“正读”和“误读”并非泾渭分明。

“客观”的历史(传统意义上的)尚且如此,“主观”的文学作品(一般意义上的)更不易区分“正读”和“误读”。关于读者接受与理解的多种可能性,下面的言论是我们所熟悉的:

① (清)凌廷堪:《戴东原先生事略状》,《校礼堂文集》,中华书局1998年版,第317页。

② 有关近年来“误读”一词的使用情况,可参见周新顺《“误读”之辨误》,《文史哲》2008年第3期;常娟《试论“误读”在学界的被误用》,《海南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4期。

③ 参见盛宁《新历史主义·后现代主义·历史真实》,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1997年第1期。又,一个生活现象可以用来做注脚:经常有人说,某个特型演员演毛泽东演得真像,另外某个演员演得不像。他们判定“像”与“不像”所持的是传统史观,即以是否等同于客观事实(毛泽东本人)为第一要义。但他们的判断本身却具有“后现代”的意味,因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见过毛泽东,他们所理解的客观事实实际上是由“文本”(诸如各种有关毛泽东的图文资料)建构起来的,他们所做的判断又成了新的历史“话语”。

④ 参见王岳川《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》,《广东社会科学》1999年第4期。

《诗》无达诂，《易》无达占，《春秋》无达辞。^①

作者之用心未必然，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。^②

（《红楼梦》）单是命意，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：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官闱秘事。^③

他如“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桎，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，不害也”^④，“作者用一致之思，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”^⑤，“古人之言，包含无尽，后人读之，随其性情，浅深高下，各有会心”^⑥，“作诗者以诗传，说诗者以说传。传者传其说之是，而不必尽合于作者也”^⑦云云，皆可见中国传统文论对于读者诠释空间的认同。

当代学者对此也有很多论述。如钱钟书先生《管锥编》引黄庭坚“人得交游是风月，天开图画即江山”句，谓“庭坚句言山水乃天然图画，公望断章取义，言云族有如‘天’空上展‘开’山水‘画’本”，“虽乖庭坚诗旨，而自具心得，堪称‘创造性之误解’，不妨‘杜撰受用’”^⑧。叶嘉莹先生则从文本潜能和读者诠释的双向角度予以阐发：

①（西汉）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》卷三《精华》，赖炎元：《春秋繁露今注今译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，第81页。有关“诗无达诂”的“本义”，可参见张敏杰《〈春秋繁露〉“诗无达诂”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》，《文艺理论研究》2004年第2期。

②（清）谭献：《复堂词话》一，《介存斋论词杂著 复堂词话 蒿庵论词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，第19页。吴世昌先生评曰：“复堂之‘作者之意未必然，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’，乃随心所欲，教人造谣，欺人太甚。实乃对真理的嘲弄，良知的奸污。”（《词林新话》，《吴世昌全集》第6册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20页）吴氏之评，忽视读者接受的能动性，有失公允。

③鲁迅：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八卷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79页。

④《二程全书·外书》卷6程颐语，四部备要本。

⑤（清）王夫之：《姜斋诗话》卷一，《四溟诗话 姜斋诗话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，第139—140页。

⑥（清）沈德潜：《唐诗别裁集·凡例》，岳麓书社1998年版，第4页。

⑦（清）袁枚：《程绵庄诗说序》，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1765页。

⑧钱钟书：《管锥编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78页。

可以笼统地说,凡是好的作品、大家的作品,其文本中必然蕴涵有丰富的 potential effect,从而能够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,作出不同的诠释。但形成 potential effect 的那个原因、因素是不同的,而读者诠释的方法和态度也是不同的。首先,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,最传统的讲文学批评的人,都是在文本中推寻作者的原意(original meaning)。当西方一些新学派,如读者反应论、接受美学等等兴起后,就有人提出,一切艺术品在未经读者或欣赏者再创造以前,都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成品(artefact),它一定要经过读者或欣赏者的再创造,才能成为一种美学的客体(aesthetic object)。但读者的背景不同,天性不同,生长环境也不同,所以他们做出的诠释自然也不相同。于是,诠释学提出了“诠释的循环”(hermeneutics circle)这一术语。所谓“诠释的循环”有两种解释,一是说在诠释时部分与全体互相连络相关:懂得了整体,才能懂得部分;反之,懂得了部分,才能进一步理解整体,跟鸡生蛋蛋生鸡一样。另一种解释是说诠释者对于追寻“原意”所做的分析和解说,势必都染有诠释者自己所在的文化时空的色彩,就如同盲人摸象一样,他们总是不能摸到大象的全体,因而也不能得到整体性的认识。因为每个读者的具体情况不同,所以读者的诠释最终又回到读者本身,而不是作者的本意(the author's original meaning)^①。

在接受美学的理论中,“误读”是被允许,甚至是被鼓励的。18世纪英国小说家劳伦斯·斯特恩说:“要真正尊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,最好是友好地把理解对半分给作者和读者,给两者留下供想象驰骋的天地。就我来说,我总是赞扬这样的读者,尽我最大的努力让读者像我一样尽情地施展其想象力。”^②而美国文艺批评家哈罗德·布鲁姆的“误读”理论,更具有广泛的影响,论者谓“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”^③。下面

① 叶嘉莹:《从文本之潜能与读者之诠释谈令词的评赏》,《天津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0年第2期。

② 转引自张中载《误读》,《外国文学》2004年第1期。

③ 徐文博:《“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”(代译序)》,〔美〕哈罗德·布鲁姆《影响的焦虑——一种诗歌理论》,徐文博译,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,第1页。有关中国学界对布鲁姆及其误读理论的接受和研究情况,参见罗杰鸮《哈罗德·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》,《思想战线》2007年第1期。

这段话是经常被引用的：

诗的影响——当它涉及两位强者诗人、两位真正的诗人时——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。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，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。一部成果斐然的“诗的影响”的历史——亦即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——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的历史，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，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，而没有所有这一切，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。^①

解构主义语境中的“误读”是有意识的创造性解读。布鲁姆等耶鲁学派的学者们“强调从文本不起眼的小地方或矛盾、含混的地方去翻掘在既定话语掩盖下的潜在意义，进而使不同意义自由竞争，在阻绝传统批评总要从多种意义、多种解释中突出一种意义、一种解释的道路时，坚持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自由性，使文本意义解读活动成为一种‘自由游戏’，使一种意义主宰一切让位于多种意义并置或互相对立”^②。“误读”内涵的重新建构，对于消解正/误、优/劣的二元对立范式，宣扬多元共生，具有积极意义。它与接受美学皆以颠覆作者和文本的中心地位，突出阐释者的主体性为要务，但二者仍有本质区别：接受美学所谓的阐释是“主体生产出一种书写或口头的陈述，解释或印证先在的文本的意义。因而阐释便被认为是派生的、寄生的或介乎二者之间的”。“相反，‘后现代派’的批评家们否认这种文本与注解之间的共同的接受关系。在这种参照框架中，批评并没像创造某物一样卷入一种阐释活动。这里强调的不是阐释的次级方面，而是新的文本的产生”^③。

综上可知，“误读”既有与“正读”相反的含义，在接受美学理论和解构主义语境中，又有“创造性”的积极意义。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陈述“误读”的多重含义，旨在表明一个基本立场：对于《三国演义》

① [美] 哈罗德·布鲁姆：《影响的焦虑——一种诗歌理论》，徐文博译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31页。

② 王岳川：《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44页。

③ [德] 姚斯、[美] 霍拉勃：《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》，周宁、金元浦译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448页。